

# 從戴高樂逝世看今後法國動向

陳澤豐

法國前任總統、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國際風雲人物戴高樂將軍，十一月九日晚七時三十分在其所熱愛的科隆貝(Colombey-les-Deux-Eglises)鄉居，因心臟病發猝逝，享年七十九歲，距其八十歲生日僅差十三天。戴高樂的一生多采多姿，繫法國國運幾達三十年之久，其於世局的變化亦舉足輕重，故其死除歷史意義外，尚具有政治意味。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曾說：「死者支配生者」(Les Morts Gouvernent les Vivants)。戴高樂逝世後，其於龐畢度個人的決定，是否仍具有支配力量，於今後法國的政策，是否仍具有影響作用，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要目標。

## 一 強人的一生

查理·戴高樂(Charles Andr'e Joseph Marie de Gaulle)，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於法國北部的里耳(Lille)，父親亨利戴高樂(Henri de Gaulle)是位哲學教授，在一間教會學校執教。戴高樂自小聰明過人，在「聖約瑟中學」(Collège Saint-Joseph)完成中等教育後，即於一九〇九年四月考進有「法國西點」之譽的「聖西爾」(Saint-Cyr)軍校攻讀，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始。由於他身高六呎四吋，兼之性情嚴肅孤高，自命不凡，所以同學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大蘆筍」(The Big Asparagus)。一九二二年十月，戴高樂以全班二百二十名中名列第十三的優異成績畢業，官拜陸軍少尉，選擇於第三十三步兵團服務，團長即是後來組織維琪政府的貝當(Philippe Pétain)。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戴高樂曾三度受傷，並因作戰英勇而獲得勳章，但終為德軍所俘，逃亡多次均未成功。德法簽停戰協定後，被釋的戴高樂又自動請調至波蘭狙擊部隊服務。一九二〇年，他參加華沙保衛戰。一九二一年四月，他與出身工業世家的伊鳳(Yvonne

Vendroux)結婚，時年三十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因當時「高等軍事法庭」(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Guerre)副主席貝當的推薦，得入「高等軍事學校」(E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受訓。一九二四年，就在他受訓期間，戴高樂完成「敵人的爭執」(La Discorde Chez L'ennemi)一書，主要敘述大戰期間德軍不服從命令和紀律敗壞的事實。一九二七年底，戴高樂升任少校。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服務於設在貝魯特(Beyrouth)的法國近東兵團參謀部。一九三二年，因貝當元帥的提拔，返國任「國防最高會議」(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Defense Nationale)祕書，直至一九三五年升任中校為止。同年，出版「劍鋒」(Le Fil de L'épée)一書，論述戰爭的原則，政治與軍事的相互關係和軍事領袖的塑像。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戴高樂有鑑於法國的脆弱、疲敝和德國的威脅日增，因此撰寫「走向職業軍隊」(Vers L'armée de métier)一書，指出未來大戰的勝負和法國的命運，將取決於具有快速突破功能的坦克部隊，所以他反對把法國軍隊服役期限縮短為一年，主張法國應儘早發展一支裝甲部隊，以應付閃電式攻擊，可惜議會沒有通過他的建議。觀乎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裝甲部隊決勝的事實，足證戴高樂有先見之明。

一九四〇年五月，戴高樂晉升為准將，指揮一師軍隊，與德軍作戰。巴黎淪陷後，戴高樂逃至倫敦，以自由法國領袖自居，號召法國人繼續反抗納粹。一九四四年，盟軍登陸諾曼第，戴高樂隨之凱旋回巴黎。一九四六年，法國第四共和成立，戴高樂因厭惡政黨鬥爭，乃退出政壇，在此後的十二年，埋首於科隆貝鄉居撰寫回憶錄。直至一九五八年，法國因阿爾及利亞問題，瀕臨內戰邊緣，戴高樂始東山再起，先以命令治國六個月，穩定人心，鞏固社會秩序，繼即組織第五共和，集大權於一身，成為拿破崙第三以來最有力的國家元首。一九六五年，戴高樂再度當選，連任為期七年的總統職

位。面對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潮和工潮，他宣佈改革計劃，解散國會，重行大選，終於僥倖渡過難關危局。一九六九年，戴高樂仍想運用其個人影響力，將其政治前途孤注一擲於地區及上議院的改革計劃上。他表示，如果公民投票失敗，便自動辭職。最後，法國多數公民終於拒絕他的方案，投票揚棄了他。戴高樂在傷心之餘，實踐諾言，立刻脫離政治舞台，先赴愛爾蘭渡假，然後退隱山林，以撰寫回憶錄來渡過他寂寞的晚年。

綜合戴高樂的一生，無可諱言地，他對法國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他打破傳統的阻力，而與世仇德國修好。他具有遠見地領導六國成立共同市場，奠下西歐團結的基礎，這都是政治才能的了不起表現。然而，他爲了法蘭西的光榮和偉大，爲了在美俄之外建立第三勢力，不惜承認共匪，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並兩度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這都是爲「親者痛、仇者快」的失策，並爲自由世界所一致詬病的。

## 二 未完成的回憶錄

戴高樂自去年四月公民投票失敗不久，即歸隱科隆貝鄉居，埋首於回憶錄的寫作，晨昏與林間飛禽、水中游魚作伴，不問政事，更少接見訪客。他之所以如此，主要因素爲來日無多，想以有限之歲月，將他的一生經驗，提供給後人參考，爲他的國家指出一條在他看來是應循和可循的道路。

戴高樂自一九五四年開始，即陸續出版過三卷「戰爭回憶錄」(Mémoires de Guerre)，第一卷名爲「號召」(L'Appel)，敘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間之事；第二卷題爲「統一」(L'Unité)，述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之事；第三卷稱爲「拯救」(Le Salut)，記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間之事。

戴高樂的新作，定名爲「希望回憶錄」(Mémoires D'Espoir)，亦分三卷，第一卷名叫「更新」(Le Renouveau)有譯「東山再起」，始於一九五八年第五共和成立，止於一九六二年。第二卷題爲「努力」(L'Effort) (一九六二—六五)，尚未完稿，戴高樂已遽歸道山。按原訂計劃，三冊回憶錄擬分三年出版，即一九七〇、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各出一卷。第一卷原定於十一月廿二日戴高樂的八十壽辰前兩天出版的，但終於

提前於十月下旬問世，據說主要爲了向當時正在訪問莫斯科的龐畢度總統搶鏡頭。正因如此，戴高樂始能及身見到此第一卷回憶錄的出版，並聽到有關它的各種批評。

一般法國人對第一卷回憶錄——「更新」的批評，可以說毀譽參半。譽之者可以「卓越崇高」(Hauteur)，「率直簡單」(Simplicité)，「清澈寧靜」(Sérénité)三句話概括。戴高樂文學修養之深，寫作技巧之高，見識之卓越在書中表露無遺，故謂「卓越崇高」；以三百頁之篇幅，欲描寫四年期間之人與事，自難鉅細無遺，故曰「率直簡單」；書中除少部份外，不作憤激之語，不涉人身攻擊，清澈透明，平靜溫和，故謂「清澈寧靜」。

貶之者，也舉出幾點事實：(一)驚人的遺漏——戴高樂在書中對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均有或多或少或少的描繪，獨於龐畢度總統，幾乎隻字不提。按龐畢度始終是戴高樂的主要輔弼，這種有意的遺漏，不僅不可思議，且顯有失風度。傳聞兩人失和，由此更信而有徵矣！(二)不够詳盡——書中對若干重大事實，例如拒絕杜勒斯的原子合作建議，反對甘迺迪的干涉越戰等，往往一筆帶過，或只作肯定之判斷，少有揭露性之剖白，無補後人之瞭解。(三)時間、人物、事實有出入之地方爲數不少。總之，就內容言，此第一卷回憶錄似較戴高樂早期之「戰爭回憶錄」遜色。

## 三 北約與美法關係

戴高樂去逝，尼克森總統即中止在佛羅里達州的休假，率同國務卿羅吉斯和特別助理季辛吉飛往巴黎，參加在聖母院所舉行的喪禮。尼克森弔喪之舉，並不足奇，蓋當年戴高樂也曾兩度飛往美國，參加甘迺迪和艾森豪的喪禮。

論美法關係之不和諧，似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艘「自由法國」的軍艦不發一砲一槍，便將位於紐芬蘭南端的原法屬聖彼德和米格龍羣島(Iles Saint-Pierre-et-Miquelon)「解放」了。這種純以政治虛榮心爲動機的軍事行動，曾使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和其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大爲激怒。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坦承，「解放」聖彼德和米格龍羣島，乃是對美國領袖的精神狀態

的一種考驗，顯然並未忘記此事。一九六三年八月，當甘迺迪總統在位時，曾向一位記者透露，戴高樂拒絕簽字於核子禁試條約，而觸怒美國。

尼克森自一九六八年當選總統後，即致力於消除美法之間的歧見，使兩國關係正常化。尼克森的努力，比其前任的成績出色，主要歸功於兩點：（一）尼克森和戴高樂的私交不錯。據法國記者透露，一九六三年，當尼克森競選加州州長失敗，以普通律師身份路過巴黎時，戴高樂不僅接見他，且邀他面談，態度之誠懇，完全不似對待一位加州的失敗者，而視同未來的美國總統，使尼克森大為感激，因而奠下兩人私交的基礎。（二）尼克森有意無意的接受了戴高樂的政策。尼氏當選總統，由於國內反越戰浪潮的幫助甚大，因此自覺不能再將美國陷溺於越南的泥淖中，故有和平計劃之建議，此無異承認戴高樂的「金邊宣言」原則。尼克森並承認，美國自認為「世界的憲兵」和「歐洲的監護人」的時代已經結束，這正是戴高樂的歐洲政策所追求的目標。（註一）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訪問巴黎，使戴高樂接受了訪美的邀請，但因公民投票的失敗，前往美國的不是戴高樂，而是他的繼承人龐畢度。綜合言之，美法之間的關係自一九六九年以來雖有轉機，但成效並不顯著。

現在戴高樂去世了，法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對北約的態度，是否會有所轉變？憑心而論，華府朝野人士是希望法國轉變的。據美聯社華盛頓十日電稱：「美國官員希望戴高樂將軍的逝世，使法國回到北約同盟的軍事組織中。戴高樂辭去法國總統時，也曾掀起了同樣的希望，不過這種希望，瞬即消逝。好些美國軍官相信龐畢度總統在戴高樂仍然生存的時候，不可能使法國重新回到北約軍事組織去」。美國若干官員甚至由戴高樂的死，認為龐畢度已解除來自科隆貝的一切干預，進而預言法國將重返北約。這種毋視法國政策本質和不明戴高樂與龐畢度後期關係的樂觀看法，是難於立腳的。戴高樂於一九六六年之所以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一方面是他想緩和東西歐間的軍事對峙局面，這是他「東向政策」的本質，一方面是因為北約的體系侵犯了法國的主權，這與他所標榜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是相違背的。一旦龐畢度仍繼續戴高樂政策，不管戴高樂在世與否，法國的政策仍然是不變的。在可預見的將來，法國或可能與北約盟國改善關係，但她是不會重返北約軍事組織的。

#### 四 法國與共同市場

戴高樂在位時，曾分別於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七年，兩次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使英法關係一度陷入低潮。戴高樂否決英國入會的主要口實是，「英美的特殊關係將會破壞歐洲共同市場的獨立性質」，一旦英國入會，「英國將成為美國在歐洲的『特洛伊城的木馬』(Le Cheval de Troie)」。戴氏在其回憶錄中也不諱言的指出，「英國本身的性質、結構和處境與歐陸國家迥異」，因此，他變成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的衛護者，獨自努力於建造一個「歐洲人的歐洲」，以擺脫美國的影響為職志。

戴高樂死後，法國對英國申請入會的態度，會不會有顯著的改變？這是衆所關心，尤其是英人最矚目之事。一位英國作家謝巴德在星期日泰晤士報說，戴高樂將軍之去世，可能為英國與法國的再度親近鋪路。他說，法國只是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它的農業制度頭重腳輕而落後，它的工業是老式的。戴高樂派的法國，從未有足使克里姆林宮留下印象的樣子或傳統的軍事武力。就工業方面言，即令在戴高樂當政時期，亦不如西德。作者結論說：自戴高樂退休後，法國即開始面對現實，法英的關係在語氣上亦漸趨和好，故他相信，戴高樂去世後，會更加速此一進展。（註二）

另英人路易海倫(Louis Heran)亦持相同看法。他認為戴高樂一死，法國將採取較富彈性的政策，一方面因為龐畢度不必擔心來自科隆貝的斷然干預，而造成會談的破裂，一方面龐畢度本身已經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不須太在意戴高樂派。當然，龐畢度仍將維護法國的利益，但雙方合作的可能性似乎增加。（註三）根據英人估計，英國入會的談判，可能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告一段落，而備以批准入會條約可能於一九七二年擬定。

雖然戴高樂已經去世，但這並非意味英國這次申請加入，不會再受到阻力。事實上，許多觀察家及共同市場人士均承認：目前法國政府是否一改過去反對的態度而表示同意英國加入，仍然是一項重大疑問。羅馬方面為了這件事情的展望而極表悲觀。一位接近共同市場談判的義大利人士稱：「不管法國人是怎樣地流露有禮的態度，然而，法國仍然跟共同市場的其他會員國的意見相左。對於主權的問題，目前法國政府官員所採取的態度，仍然像戴

高樂所表現的那樣，沒有絲毫改變。」（註四）另一些比較不如是悲觀的觀察家，認為法國可能認真並慎重的考慮這個問題，而不致輕率地第三度否決英國的申請，因為如果法國再次拒絕英國入會，可能永遠扼殺歐洲政治經濟統一的機會。積極來說，這一次法國的態度可能改變，因為巴黎政府正打算在共同市場的各理事會內反擊有增無已的西德勢力。英國的入會，對法國的這項反擊計劃而言，說不定是有利的。正如荷蘭外交部長倫斯（Luns）所說：「法國人具有許多特質，其中一項就是講求現實。他們意識到必須面對現實而有所決定了。」

基於上述，儘管龐畢度總統或會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放鬆對英國入會的申請，但英國所將付出的代價仍然是高昂的，它所經歷的過程，仍然是艱辛的。

## 五 英法核子合作問題

正當全世界都在注視美國照着尼克森計劃，逐漸從南越分期撤兵的時候，美國忽然和西歐盟邦發生美軍應否撤離歐洲的爭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德堅決主張削減駐歐美軍，他的提議立刻獲得多數參議員的支持。尼克森總統雖未直接表示他的態度，可是前副國務卿李查遜公開反對曼斯菲德的主張。他說，美國如於此時撤減駐歐美軍，既將削弱美國和蘇俄的討價還價，又會損害北約組織的團結力量。因為美國一撤兵，其他盟國一定起而效尤，此來北約組織就會解體，也可能觸發核子戰爭。

美軍撤歐的問題尚未解決，同時即有英法核子合作建議的提出。緣今年三月，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葛里夫斯（Eldon Griffiths）與研究部的尼布洛克（Michael Niblock）共同發出一份小冊子，建議英法核子部隊合作，給歐洲提供核子阻遏力量。此項由美國支持的核子合作，初期僅負起西歐核子防務的責任，接着負起戰略責任。作者說，英國和法國應該在兩國未來的核子武器系統中合作，這種力量必須在北約組織內部發展。這表示法國將來對盟軍的軍事策劃所負的任務，要比目前為大。小冊子最後結論說，若欲建立歐洲防務的基石，以取代美軍的撤退，英國必須加入共同市場，法國必須重返北約。（註五）

事實上，英法核子合作並非是一項新建議，早在一九六五年，現任首相、保守黨魁奚斯（Edward Heath）便有此構想。他在今年七月，於國會答覆前工黨國防部長希利（Healey）有關核子合作的可能性時便表示，他在一九六五年即提議英法核子合作，最近又重彈舊調。他說：「當我第一次作此建議時，法國還是北約的一員；當我重提此議時，我希望透過英法核子合作，把法國重新帶進北約。當然，法英兩國領袖間對此仍有歧見存在。」（註六）

英法核子合作的建議，在美國暗示和支持下，由英國率先提出，其主要用意似欲藉此將法國拉回北約，或在北約之外，另行建立一種核子防衛系統，而其最終目的，仍想把法國納入以美國為指揮中心的歐洲防衛系統，這一點正是法國所難以忍受者。今年七月，龐畢度總統在答覆記者有關核子合作問題時，說：「英法之間可能有，甚至盼望有核子方面的協定，但一切有個限度。別人不該希望我們踰越這個限度，特別是，誰也不能把法國拉回北約。」（註七）言下之意，對於別具用心的英法核子合作建議，並不感到興趣。事實上，在英國尚未加入共同市場以前，英法核子合作前途困難尚多，目前似言之過早。

## 六 結 語

多年以來，法國人一直反躬自問：「戴高樂之後，法國將如何？」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派認為戴高樂逝世後，所謂「戴高樂主義」（Gaullisme）或「戴高樂派」（Gaulliste），均將隨其創立者的消失而變得無影無踪；戴高樂生前所建立的制度和機構也將被棄之如敝屣，其政策也將完全被更張改弦。

相反的，另一派認為，戴高樂雖死，法國將踏着戴高樂所開闢的途徑，所留下的痕跡，以相同的方法和不變的原則繼續前進。

一年半以來，事實證明，沒有戴高樂，法國並沒有混亂，並未走向深淵。龐畢度不是戴高樂，他不可能，也不想成為戴高樂。龐畢度沒有前任的聲望與外交手腕，法國和歐洲也不再是六十年代的法國和歐洲，所以他採取

剿緬北的緬共與叛軍不斷奏凱，並未對支持宇汝的吉蒙軍展開戰鬥。由全緬各地所舉行的支援前線羣衆大會，一致指責的都是「賣國賊」，可見軍方一時尚不敢捨棄共匪卵翼的緬共與左翼叛軍而全力對付內爭，恐因此再犯衆怒。

果然如此，則尼溫政府唯有開放政權，邀請被釋出獄而比較接近軍方的各政黨及邦族領袖組成聯合政府，俾與宇汝及吉蒙各族由談判解決爭端；否則縱使與共匪得到妥協，亦無法避免兩面夾攻，共匪是決不會令緬共放棄「武鬥」的。

緬甸期望共匪不侵犯其邊界，並非條約所能保障，從匪緬建交二十一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出：祇要滇緬邊區反共義軍興起，共匪即不敢進犯緬邊，且對緬多方遷就籠絡。當一九五五年，匪軍首次進侵瓦邦，正是中國反共義軍首次撤退以後。至一九五九年滇邊反共義軍再起，西藏抗暴事件發生，滇康藏反共武裝已形成結合之勢。所以有一九六〇年共匪對緬割地借款等種種示惠，其目的即在籠絡緬方再迫反共軍撤離緬北，因而有一九六一年中國反共軍的再度撤離，由共匪豢養的緬共即乘機進入緬北，造成此一地區混亂而影響泰寮。

緬人反匪的怒潮，是憎恨共匪教唆緬甸軍政府實施殘酷統治，其擁護政府反匪，乃祈望政府採取反匪外交路線後而改變殘酷政策。軍政府再與共匪化敵爲友，企圖藉此保障邊疆，鞏固政權，其結果如何？無疑的是自毀誤國而遺禍鄰邦，無怪乎鄰邦對宇汝奪權一致同情。

註(一)(二) 請參閱本刊五卷九期拙著「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

註(三) 見五十九年一月廿八日中央日報「一年來的緬甸政局」

註(四)(五)(六)(七) 請參閱本刊六卷十一期拙著「緬甸反匪羣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及七卷三期「毛共與緬甸之交惡」

註(七) 請參閱本刊六卷四期拙著「尼溫訪美與緬甸動向」

註(八)(十一) 見五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中央日報緬甸通訊「尼溫與宇汝的政見」一文

註(九)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泰國世界日報記者訪問訪緬歸來的巴

博副院長談話

註(十) 見五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香港真報譯載倫敦泰晤士報通訊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註(十三)(十四)(十五) 見本年九月二日中央日報仰光通訊「緬甸內憂外患」

註(十六)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日報仰光航訊

註(十七) 見本年十一月七日星島日報載美聯社、法新社仰光六日電

註(十八) 見本年十月廿日星島日報載美聯社、路透社曼谷十九日電

上接第21頁

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作風，不徒託空言，不好高騖遠，從這一點看，龐畢度稱得上「識時務的俊傑」。

龐畢度原是戴高樂的主要輔弼，但根據法國作家亞歷山大(Philippe Alexandre)(註八)的說法，這一對好搭檔已經由親而疏，由愛而怨，終於走上衝突、分手的悲劇。從這一點證明，戴高樂個人對於龐畢度總統的影響力是微乎其微的。法國觀察家有認爲戴高樂的死，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公民投票的失敗，第二階段才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的壽終正寢。由戴高樂退隱科隆貝期間的不問政事，甚少接見訪客一事看來，其個人的政治生命似已告結束，其個人影響力也是有限的。

雖然來自科隆貝的影響力已告解除，但衡諸法國國情，戴高樂政策今後恐怕仍將支配法國，如果它是合乎法國人的利益，合乎法國人的立場的話。沒有戴高樂的法國政府，在作風上或可能比較平實，態度上可能較易於打交道，但若希望其改弦更張，作大幅度的轉變，那是緣木求魚的想法。

註(一) Le Monde 12 Nov. 1970

註(二) 中央社倫敦十一月十七日電

註(三) Times, Nov. 12, 1970

註(四)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工商日報

註(五) Times, Mar. 23, 1970

註(六) Le Monde, 23, Juillet, 1970

註(七) Le Monde, 4 Juillet, 1970

註(八) Philippe Alexandre, Le Duel de Gaulle-Pompidou.